

百年人生 适逢其时

○黄树颜（1945经济）

我生于1920年，论年龄，与绝大多数联大同学一样，出生于辛亥革命后不久，成长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青年一代心中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一颗你我有责之心，但不知一切从何做起。幻想当医生，救死扶伤；当工程师，修桥铺路；办示范农场，搞农业科学……抗日战争开始，在上海，投入了抗日反汪斗争，宣传救国救亡，东冲西撞，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1940年被迫逃离上海，到了大后方重庆，在那里原以为可大搞一番抗救大业，但可能年轻人好高骛远，却感到有点“失望”，好像个人无可作为。幸亏考进了这座“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定下了读书救国的初步目标。由于战时经济的重重困难，似乎悟到了经济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因此进了经济系。

联大四年，得益匪浅（现在想来，更是影响我一生的关键）。由于我在上海澄寰中小学和东吴附中求学时已打下了较好的文理基础，养成了好学的习惯，一进这座由三大名校联合、有强大的大师级名教授的大学，顿时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之心。中文师从沈从文，英文师从杨西昆、刘世沐，数学师从杨武之，化学师从杨石先，经济学师从系主任陈岱孙，政治学师从龚祥瑞，统计学师从杨西孟，货币银行师从周作仁，财政学师从秦瓚，社会主义

经济学师从赵迺搏，经济理论与毕业论文导师师从周炳琳等各位先生。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讲学各有千秋，重启发、多引导，跟他们学习真是人生一大幸福。这四年不但使我打下了经济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我缜密的逻辑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学论证的治学之道。除此之外，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对经济问题这一重大热点的讨论真是百家争鸣，报章杂志，连篇累牍；新校舍大门口的各家壁报，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尤其校内的晚会、学术讨论会、时事讨论，几乎每晚都有。每到周末，教授同学同台讨论，热闹非凡。因此我对当时的实际经济问题，也就比较熟悉。总的感觉是，民主讨论，各抒己见，其中很多真知灼见，启发很多，有些意见也令人钦佩，但总有难以为信之感，因为其中多数流于空泛的“大道理”，各说各话，缺乏实证！当然，在当时，很难有可靠翔实的统计数字，也还没有一套比较有效的用实际数字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此不能奢求！

由此，我逐渐萌生了改革经济研究方法的设想，我把它称为“实证”。

1945年抗战胜利，正好我联大毕业，又逢全国留学考试，考取留美。在那里我发现“实证经济”的研究实际上已初露头角，在实践中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我欣喜若狂，除了选读有关著作外，大量搜集有关资料。1949年夏，一个机会，喜

□ 我与清华

获美国来华撤侨的“戈登将军号”船票，9月中旬回到祖国，参加了开国大典，又进了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现中国人民大学），满心希望以“实证经济”为国效劳此时我年将届30。

我理解的“实证经济”，是以科学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利用数学与统计学的方法，结合经济理论，研究某项经济命题的可行性或检验其实际效果的一门三结合学科，应该对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是大有可为的。不幸，偏偏碰上了当时国内极左思潮的冲击，说什么这是数学游戏，是欺骗劳动人民的把戏！这是一顶很不小的政治帽子。这样，我的“法宝”被一棍打死！从而在我回国第一个三十年中只能单独教统计学、数学、经济学，但不能三结合。壮志难酬，奈何！此时我将年届60。

80年代改革开放，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有幸在国家统计局领导的创导、上海财经大学的大胆支持下，在财大开始试办，在财经专业中加强数学基础，讲授数

理统计，系统地研究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三结合，培养这方面的高级人才，并在全国高等财经专业中推广。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领导的重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国内外有名教授和专家也给以很高的评价。为此上海市给了我记大功等多项荣誉，国务院也给予特殊津贴奖励。2009年，当我90岁寿辰的时候，世界和全国各地的部分学生在上海财大召开了该学科的科学研讨会，出版了有关专辑，展示了一些成果，标志了我一生愿望已初显曙光。有此，我愿足矣！并深深感到：一个人的人生，子女是肉体的延续，而学生是事业的延续，是志愿的延续，代代相传，是永久的，是最重要的。

这百年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的百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想来，我们年轻时所谓的“天下兴亡，你我有责”的雄心壮志，所谓“从医、从农……”等等真是太渺小了。今天，这一切不早已成为现实了吗？从而感到这个百

年是人生跌宕起伏、生活特别丰富的百年，有幸生逢其时，备感幸福！

我的百年是个别的案例，但我相信也是我们联大同学经历的一个缩影，我的经历中有你的，你的经历中有我的。都是人生百年，适逢其时，谅老同学也一定有此同感吧！



1945年，做毕业论文的同学与导师周炳琳老师（前左4）合影，前排左起第5位为作者黄树颜